

◆张彤

头等大事

前几天,我在大剧院看了一部话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面的松子有一段恋情,对方是一位开发廊的男人。故事发生在玉川上水,因太宰治在这里投河而成为自杀胜地,松子感情失败,原是去这里寻死的,不想被开发廊的男人救了下来。发廊开在如此缥缈之所,可以看出剧作者的用意——小小发廊,象征着苍茫人世中那些微小的真实,就像齐白石写意画中的瓢虫,整张纸都是泼墨写意,花非花,叶非叶,唯有此处,实得不能再实,与真瓢虫不差分毫。发廊无关江山社稷爱恨情仇,日常因而有烟火气,但是,头发并不是一件微小的事。

我小时候头发又多又硬,如果头一晚洗澡未及吹干,第二天醒来一照镜子,就完全是一只仙人球。我每次去理发都必须打薄,然后才考虑造型的事。这样过了许多年,偶有一次去理发,我还是让师傅先打薄,那个小伙子跟我PIAPIA地说“葛(哥)呀,你这头发可不漏朵呀(不算多)”,我才意识到头发这东西也会掉。不久,我去理发,师傅们的口风就全变了,每次理完都说“这样好”,因为“这样显多”。又过了几年,显多的问题也不再探讨了,每次理发时间都很短,而在洗头的环节,在某些部位只是虚晃一下便草草了事。我心中暗自惊叹,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经进入到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人生新阶段,因而也就越发感受到了头发的重要。

理发是一种手艺,也是一门小生意,古代有走街串巷给人理发的,挑着水盆火罐,所以说剃头的挑是“一头热”。有这么一套一头的家什,基本就能养家糊口了。改革开放初期,会做生意的温州人创业,最先就是开发廊。我记得中学时校园外就有一个温州发廊,挂着一个灯箱,上写大大的“發”,其实,头发的发在繁体字里应该写成“髮”,不知是老板不懂,还是故意要借“發”字发财,总之,这家店生意真的不错,而且,店里总在播放最新的粤语歌。理发所用的椅子十分轻巧,理发的师傅年轻又时髦,自己的头发造型亦十分新潮,与国营理发店那些穿白大褂的师傅不是一个范儿。

◆王治国

忆王冉明同志二三事

每每想起王冉明同志就会思绪不断,感慨万千。他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我的面前久久不能离开,他那真诚爽朗的笑声不时回响在我的耳边。

我和冉明同志相识在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作为摄影记者,我和我的师傅张秉山同志应约去北海舰队某军港的驱逐舰上采访,冉明同志带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任太华同志、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郭记者和新华社总社派驻青岛的陆记者一起去的,至今已50多年了。冉明同志当时在北海舰队宣传部的新闻科专职新闻摄影采访工作,他的许多摄影作品登载于《人民日报》《解放军画报》及省市军内外的报刊杂志上,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军画报》用一个整版页面发表他拍摄的在北海舰队某舰艇上的“防化学演练”并获奖,他的作品刊登在《青岛日报》上尤其多,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当时经常到报社的还有着陆军军装的范梦锦、孟庆林等。

冉明同志中等个儿,不管是穿军装还是穿便装,始终挺着溜直的腰板,一身军人气质,圆圆的脸庞总是泛着红亮的光,头发有些许稀疏,说话时露出一口雪白齐整的牙齿,时时透着热情、干练、坦率……

冉明同志长年在基层奔波,凡是可以公开报道的航海舰艇、潜艇和海空雄鹰团的战斗英雄们,如高翔、舒积成等,都是我们学习、采访的对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朴实、练达、待人真诚。他到报社送稿件时,大多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大金鹿自行车,跨上自行车总是卷起灰色军裤的右裤管(避免车链子咬着军裤),挺着溜直的腰板一阵风似的远去……

我家住沂水路3号院时,冉明同志带着学龄前的儿子去过几次。小家伙小名叫璐璐,长得虎头虎脑,手一直扯着他爸爸的衣

国营理发店是个什么范儿呢?首先得从理发店的椅子说起。

几年前,我结识了一位奇人,他有大量收藏,堆积在郊区的一个大仓库里。与一般的收藏家不同,他收藏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用到的东西,有德式老房屋的窗户,中山公园里伐掉的枯树,老工厂的招牌等等。他以这些旧物件为原材料制作出了许多既有年代感又有艺术性的作品。

在他的工作室里,我发现了一张奇特的椅子,它有一个巨大的铸铁底座,旁边有一个长长的手柄,椅子上看去既厚重又舒适,顶端有一个包了海绵和牛皮的圆托,可以放头颈,底端有同样用铸铁做的脚踏。椅子用料考究,钢铁结构的骨架处处都有镂空的花纹,而坐垫与靠垫都是整块的牛皮,缝制的针脚规整细密,说是一件艺术品毫不夸张。椅子铭牌上用英文写着“芝加哥泰奥·科赫斯公司制作”的字样。

我拍下了照片,回家在网上检索,原来泰奥·科赫斯是一家专门生产理发椅的公司,全球有许多理发椅爱好者收藏他们生产的椅子。在一个论坛上,有许多收藏者的提问,比如:“清洁和抛光1939年科赫椅子上瓷器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又比如:“我的理发椅上有白色牛奶杯形状扶手,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圆形小座椅,谁知道它是哪年生产的呢?”而在一些采购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到,这家公司至今仍在生产理发椅,只不过与古董的理发椅比起来,今天的要轻巧许多。

我们小时候去的理发店里椅子虽没有科赫斯的那么考究,但也是相当隆重的。特别是在小孩看来,这张椅子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一艘轮船——它的右边有一个舵轮,可以调节靠背的角度,最夸张时,这椅子能够基本放平。椅子放平时理发师定会手拿一把长长的剃刀,先在墙上挂着的一块皮革上磨两下,接着就用这把寒光闪闪的刀为平躺着的客人修面。小时候,有位邻居老爷爷,据说曾是一家布料商店的掌柜,公私合营后就在那家商店上班,每天骑一辆德国“钻石牌”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人造革的提包,每天匆匆忙忙。但是,我有

一次曾见他平躺在理发椅上,下巴已经涂得像奶油蛋糕一样,两眼眯着,相当享受,与平素印象大为不同。

这个影像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十分真切,以至于后来每次看到切蛋糕时都会联想到修面。修面的师傅与他显然是老相识,一边聊闲天,一边把那剃刀向脸颊贴过去。剃刀是像杨志的宝刀一样的“吹毛利刃”,下巴上的泡沫一层层剥落下来,再用雪白的热毛巾捂一会儿,看起来相当享受。想想像邻居老爷爷这样的人,每个月都是要在这利刃下走一遭的。那时的理发店都是国营的,理发的师傅应该都是饮食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正式编制,定期调级晋升,业务精,作风正,有组织,有纪律,理发店里还有流动红旗,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会搞联欢会,过年的时候发跟我们家一样宽窄的带鱼。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特别气场,理发也就显得越发不寻常。

那个厚重稳固的理发椅有长长的弹簧,坐垫起伏幅度很大,时间长了上面往往有放射状龟裂纹,犹如讲究的瓷器“开片”一般。小孩子去了,理发的师傅会在椅子上再放一张小凳子。对于小孩子来说,理发的过程很枯燥漫长,而且推子又经常夹头发,一次发理下来不哭也不闹,就可以获得很高的赞誉。时间久了,邻居们甚至会传颂,说谁家孩子可真乖,理发都不闹。

按照传统的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理发当然也就不是一件随便的事。不过,我后来对此事的看法有所改变,因为我发现理发店的门边有一个小黑板,上面列着几位师傅的姓氏,每接待一位顾客,理发师傅便会在小黑板上竖排着的“正”字里加上一道。这让我想到,自己不哭不闹忍好一阵子,也不过“正”字中最平常的一道,不禁有点惆怅。

也是没几年的工夫,“發”廊开遍全国,像那种旧式的理发店已经难觅踪迹了。国营理发店的师傅也就星散了。多年前,在沂水路上有一个理发店,剪一个头只要三块,老师傅手艺好,也没什么闲话,像是“落草”的大侠。他手快话少,唯一的缺点是洗头坚持用青松牌肥

皂,每次理完发都顶着一头奇怪的味儿回单位。后来,有同事自带洗发水去理发,据说还引起了师傅的不快。殊不知,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洗发水已经成了一门大生意。

上大学时,每到毕业季都会有许多用人单位来学校开招聘会。那时最吸引人的不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也不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而是一家做日化用品的跨国公司。这家公司生产的洗发水行销全球,上世纪90年代连同“维他命原B5”一类令人费解的术语一道带进中国。公司每年招聘会都大受关注,所招毕业生基本也不限专业,学什么的都有用武之地,而人所共知的是,只要一进公司起薪即是四千元,出差必住星级酒店。那时,一个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几百元,如此高的薪水自然吸引人。那几年,这家公司每年都会在我们学校招十几个毕业生,而最神奇的是,据称入围的同学会参加一场由公司老板亲自出面的晚宴。宴会设在西湖边上的楼外楼,因老板是瑞典人,宴会全程英文,假如表现不佳,也许有不被录取之忧。虽然有这么优厚的条件,我班同学毕业时没有一人去报名,而毕业后听说有两位师妹考进了这家公司,而且果然传言不虚,其中一位出差北京,住的就是长城饭店,因为住一般酒店会“影响公司形象”。北京同学因此大为感慨:不就是瓶洗发水嘛!洗发水公司高薪聘英才,或许可以说明,头发已经真正地成为了头等大事。

关于头发,我还有一个珍藏的段子。有一次,我去采访崔健,他那年刚40岁,但在我眼里已经是老人了。我说:“您觉得自己老了吗?”崔健说:“完全不。你会觉得米克·贾格尔老吗?他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这时,崔健起身给我倒水,我看他头发有点稀疏就顺口说了一句:“您头发是不是都开始掉了?”崔健一听大摇其头,他说:“你不知道,我打小头发就这么多。”事情过去多年,我想起就觉得后悔,觉得年轻时太唐突。40岁当然不老,我去年看了崔健的演出,他的确像米克·贾格尔那样,更有力量了,而且,头发的确还是像原来那么多。



◆江舟

星光大道

穿过车流不息的梳士巴利道,经过香港艺术馆,香港金像奖女神铜像伫立在维多利亚湾畔。两条长长的胶片,缠绕在胸前和臀部,线条纤细,身形舒展。左臂展开开来,托举着天空,底座镶嵌着“香港电影”四个大字。曾经辉煌风光的香港电影,就像这少女一般,青春、活力、无限向上、无限梦幻。

我当然没有资格来评判香港电影。只能从记忆碎片中,去搜寻香港电影所留下的气息和痕迹。毕竟,港片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来说,伴随着青春岁月,伴随着恋爱婚姻,伴随着成长事业,一路走来,是一辈子最值得回味的段落。

回想最早看过的香港电影,竟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少林寺》。凌晨三点,学校组队观看,李连杰那时已是一名港星了。然后是《射雕英雄传》,当然那是电视剧。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才开始真正接触港片和港星,1990年的《旺角卡门》《阿飞正传》……与之相连的是录像厅、VCD光碟和新科播放机等过时的关键词。陆陆续续,更多的香港明星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十大影帝、霞玉芳红、无线五虎、四大天王、四小花旦等等,还有谢晋、王家卫、王晶、徐克、杜琪峰、陈可辛、刘伟强、麦兆辉、许鞍华等众多大导演,不胜枚举。那时的港星都是影视歌三栖。偶像派、实力派相互叠加、相互比拼。有的靠演技,有的靠颜值,有的当老大、有的跑龙套,有的做卧底、有的当警察,有的古惑仔、有的包租婆,都能在各自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形象。

就这样热热闹闹、打打杀杀、风花雪月了几十年。新世纪之后,以《无间道》系列、《叶问》系列为代表的港片又再掀起短暂辉煌,后来还有《寒战》系列接盘延续,直到《廉政风云》系列等。

与此同时,内地电影集体崛起,贺岁档、暑期档、国庆档一波又一波浪潮。香港影星、技术人才大量进入内地市场寻求合作,香港电影作为一个独立地域的存在,越来越被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淡忘。如今,已经很难看到一部引起轰动的纯粹的香港电影了。最近看到的有评论,将刚刚上映的《金手指》与二十年前的《无间道》相比较,从剧情、到制作、到演技、到氛围,时也,势也,其实已经不可能同日而语了。

那日,我漫步在星光大道,两手交替着,与那些天王天后级的明星们手手相印,感到从未有如此近的交集。我将自己最喜欢的几个影星的手印拍下照来留作纪念。这是青春懵懂、无所畏惧时的偶像和梦中情人,是那些文艺空白年代的填补和充实,我怎么可能轻易地抹去呢。

我将最喜欢的周海媚的手印发给朋友,朋友转瞬就发来了我的手印与她的名字合体的照片。我的精神一下子恍惚了,科技将现实与虚拟竟然这么快地无缝衔接了。如今亲历于此,感慨万千,意义又何在呢?恰在这段时间里,网络上流传着周海媚女士病危的信息。人生无常,周海媚也算是同龄人了,走的早晚,本就不是人世所决定的。虽然一个人的去留,就像网络热点一样,迅疾爆发、迅疾消逝。但那最经典的《吻别》中的回眸一笑,还有周芷若的凌厉和娇羞,却始终留在有情人的脑海中。此时,耳旁倏然响起了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年轻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总觉得平淡无奇,无非就是一首有着欢快节奏的快歌,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也是值得收入囊中继续传唱下去的。

我绕到喷泉一侧的时候,迎面走来了——一位穿背带黑裙的老妪。瘦弱的身材,步履缓慢地前行,短发,两耳塞着耳机,金色的链子悬挂在墨镜腿上,从耳后垂下。老妪右手平握着手机,左臂挎着一只银色的小坤包,模样像是一只酒葫芦。我为之一颤,随即与她擦肩而过……良久,我才回过神来,赶紧抓住了一张背影。那裙的背带,像是女子的健身服,露出了肩胛骨以下的半个背部——竟然是如此的自信和淡定。我猜不出老妪的身份,但我知道,当她漫步走进那些少女的童话世界的时候,也依然是这般高贵典雅、恬淡不惊,这般从容坚定。



■街景 隋凤至

◆大梁

博物馆拾遗

眼光来看,这件青铜器上的人脸造型不免有几分滑稽。弯弯的眉毛、翻花鼻子、圆圆的眼睛,嘴角上扬好像在冲人微笑,嘴巴里牙齿颗颗分明。一个男娃指着问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好像是个面具。乍一看,的确是面具的造型,但谁会拿把斧头放脸上啊。后来看介绍,才知道“钺”在古代即是一种祭祀的器具,也曾被用做兵器,在文献中均有记载。

此外,还有《孙子兵法》《孙臧兵法》的竹简是从临沂出土的,蛋壳黑陶杯是从潍坊出土的,鲁国大玉璧是从济宁曲阜出土的等等。印象最深的是蛋壳黑陶杯。女儿对这个看上去黑乎乎的杯子并不感冒,但通过介绍,却又大为震撼。

蛋壳黑陶杯,顾名思义,就是黑陶的厚薄如“蛋壳”一般。这在今天来看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要放在三四千年之前,那时候还没有

拉坯的工具,能把杯子的厚度控制到零点几毫米,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就算胚子拉好了,可能也无法控制好烧陶的温度,而且杯身上还有镂空的设计,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直到今天都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当几千年后的我们面对它们时,不能不为之感到震撼。

我们都知道博物馆的功能,包括展示古代文明、弘扬传统文化、普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等等。但真正想通过一次展览就实现所有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文明的发展,历史的更迭一样,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提升,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认为,参观博物馆等文化艺术场馆,重要的并不是记住多少件文物和展品,而是实地走进去,感受历史所带来的冲击。就像带着女儿去参观时,她也仅仅六岁,大多数藏品对她来说都很陌生,只能看个“热闹”。但如果能静下心来,给她讲几个故